



朱德(右三)、贺龙(右四)在政委王震(右二)陪同下视察南泥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

胡平原

二

抗战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枪支弹药,发展兵工企业是陕甘宁边区的头等大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整合陕北红军分散的兵工厂、修械所,组建中央红军兵工厂。中央红军兵工厂随部队先后驻扎清涧、延川、吴起、延安、延长等地,之后迁到延安柳树店。抗战爆发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及抗战形势的需要,1938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统一管理边区军事工业。不久,军工局划归中央军委后勤部领导。1942年5月改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军工局成立后,首先将中央红军兵工厂由延安柳树店迁到安塞县茶坊镇,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按照军工局确定的“先设备,后步枪”的生产方针,从1939年起按照生产作业性质,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拆、整合,先后组建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五厂、六厂、八厂、紫芳沟化学厂等军工厂。1938年5月,创建成立了延安通信材料厂。1942年,组建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1940年至1944年,在八路军晋绥抗日前线的大后方,晋绥军区工业部一厂、二厂、四厂等兵工厂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佳县组建投产。

经过几年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兵工企业初步形成机器制造、子弹复装、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炮弹筒制造、通信设备生产等较为完整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在大生产运动中,军工局还先后创办了陶瓷厂、玻璃厂、焦

炭厂、水力发电厂、炼铁部等为兵工服务的工厂。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三

抗战爆发后,在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发展工业经济方针的指引之下,延安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工厂、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等综合工业。

这些工厂后来大都起到了边区军民抗战和生活的主要实用性作用。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边输入。而难民纺织厂创办以后,这种情况截然改变,产品服务于边区军民。难民纺织厂开始在安塞县二区高桥镇,以后迁到延安县西川口。这个工厂从开始8台机器和10个工人,到1938年底,发展到45名工人,4台织布机,2台纺毛机,2台毛巾机,5台袜子机,1台弹花机。1942年年底,职工总数扩大到370多人,房间120间,窑洞210孔,可容千人的大礼堂一座。机器装备也有很大扩充,已有铁机38台,木机18台,合股机7台,整经机4台,络纱车一百多台,还有车床、钻床、旋床和发动机等。

边区的纺织工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到1948年,边区的公营纺织工厂已发展到20多家,职工1300多人,产量3000多匹,可供部队、机关、学校人员所需要量的70%。发展到1944年,边区就有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政府系统15个厂,军工系统8个厂,中央管理系统16个厂,联防司令部系统12个厂,各地驻军有35个厂,各地专署有9个厂,各县政府有8个厂,其他单位的有20个厂;边区的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到12000多人。

军事工业,军工局一厂(机器厂)几年中,为二厂(造枪厂)和无烟药厂制造了机器设备,供给了前方(主要是一二〇师)部分机器及延安各厂的部分机器。二厂供给了边区内部队枪支的补充。三厂是化工厂,是由钱志道同志一手筹建和领导生产的,主要是制造无烟炸药、各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二厂与一厂合并后,一年供给了保卫边区的部队所用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弹筒及每月十余万发子弹,还供给前方火药和白药,供应各个根据地所需的无烟火药。留守兵团的兵工厂,1942年以前,每月生产手榴弹五六千枚,1943年提高到月产10万枚。延长石油厂和永坪分厂,百分之百的

保证了无线电台、各种机器工厂和一部分汽车和灯用所需的石油。民用工业方面,如纸张、印刷、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等,都保证100%的供应。

四

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取得“为抗战服务、保障军民供应”成就的原因在于:陕甘宁边区能坚决执行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方针。1939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产品输入受到了限制。当时,边区的建设客观上是工业没有基础,加上外援断绝,需要白手起家。主观上,当时缺少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急需选拔和培训。为了抗日战场和建设边区的需要,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边区军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建立了边区自己的公营经济,并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终于渡过了难关。

团结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发挥了他们高度的革命热情,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艰苦奋斗。当时,边区工厂的管理干部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大都是旧式大学的毕业生,有很高的知识水平。譬如钱志道、吴崇凌、王勤、林华、徐驰、陈振夏、李强等。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成为延安各厂的厂长。各厂的工人有些参加过革命战争,如赵俊,他原来在兵工厂、有技术,朱德总司令有一支驳壳枪,是南昌起义的纪念品,枪柄上的“南昌起义暴动”几个字就是赵俊刻的。中央苏区造币厂的工人手工刻下的模子,铸就出来的产品与机制的一样。

同时,陕甘宁边区在建设公营厂矿企业期间,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重点是团结工作。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邓发、李颖伯,还有边区总工会的许多同志,经常深入基层抓思想工作。工会发通知,开展向劳动英雄赵占魁学习的活动,各种思想问题得到解决,生产水平自然就上去了。

注意改善职工生活。当时,工人是工资制。津贴制按等级发给,一般干部拿1元到5元,技术干部可以拿到20元。而工人的工资最高可以拿到28元,一般都是十几元。那时边区一两角钱就能买到肉菜,工人们常有余款,有时还捐献给前方抗战将士。(连载二·全文完)



陇上非遗奇珍——永靖北乡“花儿”

翟文伟

“花儿”是流行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的一种山歌,是当地汉、回、土、藏、撒拉、东乡、保安、裕固、蒙古族等民族群众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因其流布地域、音乐特点和歌词格律的不同,分为“河州花儿”“洮岷花儿”和“六盘山花儿”三种类型(六盘山花儿也称“关陇花儿”“山花儿”)。其中,“河州花儿”普遍流传于甘、青、宁、新四省区,“六盘山花儿”流传于甘肃、宁夏交界处的六盘山地区,“洮岷花儿”主要流传在临潭县、康乐县的莲花山、岷县的二郎山一带。“洮岷花儿”为甘肃独有。河州是临夏的古称,临夏是“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主要的发源地和故乡。永靖地处河州之北,素有“河州北乡”之称,所以流行于永靖的“花儿”,人们又常常称之为“北乡花儿”。

北乡花儿属“河州花儿”,其传唱曲调主要有“河州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北乡令”“白牡丹令”“三啦啦令”等。“北乡花儿”结构工整,每首一般为四句上下两章。前段比兴,后段本题,前后两段字数相等。曲调随歌词而变,“花儿”歌唱用北方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

“花儿”是北乡人最喜爱的民歌。唱“花儿”被当地人称为“漫花儿”。无论农民、牧人、脚户、筏子手都善于触景生情,即兴编唱“花儿”来抒发情怀。唱“花儿”者不分民族、男女、老幼,也不受时间的约束。一年四季,农活忙不完,“花儿”唱不缓,山花开不败,歌声不间断。耿直爽快的庄稼汉们,在农作间隙,以歌代言,倾吐心事,诉说衷肠,赞扬政策,憧憬未来,用生动的语言和朴实的情感,描绘着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

“花儿”被北乡人称为“山歌”“野曲”。河州北乡人禁忌在庭院、村庄及有“避鞦”处唱“花儿”,这就形成了许多“花儿”山场,又叫“花儿会场”。在河州北乡“花儿”山场有十多处,流传至今,规模较大的“花儿”山场有炳灵寺、罗家洞、白塔寺、岗岗寺四处。其中炳灵寺和罗家洞“花儿会”久负盛名。在这些地方的“花儿会”上各族群众有着对唱或独唱“花儿”的久远习俗。每逢农历三月十七、三月廿七、四月八、端午节、六月六等庙会节日,永靖及周边东乡、临夏、积石山、青海民和县的群众便汇聚在一起,成千上万人组成盛大的“花儿会”。花儿会上歌声如潮,对唱、独唱的擂台赛一浪高过一浪。白牡丹、红牡丹、黄牡丹、山丹花、野菊花、刺玫花不加修饰的遍地开放。不论田间、地头、山林、深沟,都能听到扣人心弦,如痴如醉的“花儿”。人是歌手,处处是歌台,封山封不住唱把式的歌喉,禁令禁不住四面八方的歌手。“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是就这个唱法”,“白牡丹白的(者)耀人哩,红牡丹红的(者)破哩”。这就是北乡“花儿”的风采和魅力。

1959年6月12日,兰州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在炳灵寺附近联合拍摄了一部以反映永靖人民战天斗地、为改变干旱面貌而劈山开石、引黄上水、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为题材的电影《黄河飞渡》。镜头大规涌澎湃的黄河浪涛和高耸入云的积石石林,伴随着“花儿”次第涌出,令人心旷神怡。“左边的黄河右边的崖,手扳住栏杆了过来;远处的姐妹我跟我来,手扳住脖子了唱来”。《黄河飞渡》在花儿的故乡一炮走红,这首《白牡丹令》也随之成了妇孺皆知的流行歌。(连载一)

清廉仁贤的姑臧长——孔奋

柴多茂



甘肃人物·

在武威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清廉官吏,东汉时期曾任武威郡姑臧长的孔奋就是一位被誉为“清廉仁贤”的循吏。

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少年时,孔奋跟随大学者刘歆读书,常常得到赞赏和表扬。刘歆也曾对门生说,他从孔奋的身上学习到很多在书本上难以学到的东西。

西汉后期,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到了公元9年,外戚王莽夺取皇位,关中一带烽烟再起,百姓四处逃散,年轻的孔奋也携带着母亲、妻儿和弟弟等一大家子人,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了河西走廊的武威郡。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主持河西地区军政事务的河西大将军窦融聘请孔奋做议曹掾,代理姑臧长。在施政方面,他以仁义为治,抑强扶弱,使姑臧社会政治清平,经济稳步发展。

自汉武帝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后,河西走廊相对安定,丝路畅通,商贸发达,特别是畜牧业发展迅速,当时的武威郡郡治姑臧县被称为富邑。所以那时在武威郡做官的人,不到几个月就能捞取到很多不义之财。而孔奋在代理姑臧长

的4年里,没有接受过任何贿赂,也没有置办过任何家产。那时候,社会风气不正,士人多不修节操,而孔奋力行清廉,特立独行,所以常常受到他人的讥笑,说孔奋“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真是自讨辛苦。

孔奋对母亲非常孝敬,虽然他一贯主张节衣缩食,但每餐都给母亲要做最好的膳食,他和妻子则吃一些粗茶淡饭。武威太守梁统对他这种洁身自好的品行非常敬佩,所以他们见面不用行上下级之间的一些繁缛礼节,而是以挚友相待。孔奋有事去拜见梁统,梁统无论多忙都要到大门外迎候,还要让孔奋去拜见自己的母亲。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河西四郡”的一些有政绩的重要官员都被征召回洛阳,其他官吏都是大箱小箱装了几大车,唯独孔奋没有什么资财,坐着一辆空荡荡的牛车默默赶路。姑臧城的百姓和当地生活的光、胡等少数民族听闻后都说:“孔奋在当姑臧长的这些年里清廉仁贤,我们全县的老百姓都受到他的许多恩惠。他今天离去,我们为什么连一点儿表示都没有呢?”于是,姑臧县的百姓们纷纷自发捐赠了几头牛、马和一些珍贵器物,追送了几十里路,百

姓们哭着让孔奋带上,哪怕是一件也好,但孔奋婉言谢绝,一件都没有接受。

返回京师后不久,光武帝刘秀就听闻了“孔奋为千人思,敛财远送”的事情,非常高兴,遂任命孔奋为武威郡丞(郡治在今甘肃武威)。有一天晚上,陇西叛军余党的头领隗茂率人围攻武威郡府衙,杀了郡太守,还抓走了孔奋的妻子。孔奋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了,他组织郡县的衙役穷追猛攻,城里的百姓看到后也深受震动,纷纷加入进来,与官兵们一起奋力追打。孔奋还和当地氏族首领齐钟留联系,让齐钟留发动氏族群众进行追击。隗茂等人被逼急了,遂把孔奋的妻子送还,他以为这样孔奋可能就会退兵,不再继续追打,但孔奋依然率兵进行围剿,终于消灭了隗茂等。后来,上报朝廷后,光武帝下诏褒美,升任孔奋为武威郡太守。

孔奋不论是代理姑臧长,还是任武威郡丞、武威郡太守,他都清廉仁贤、为政明晰、爱憎分明。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记载:“孔奋守姑臧,天下知其清廉。”意思就是从孔奋身上,天下人才知道“清廉”是何意。千年后的《明宣宗实录》中写道:“东汉多循吏此之由也。”

一方水土,一方匾额

——清代陇南三仓河的匾额

尹国军 尹永杰



丝路文史·

三仓,位于武都区东南部,东接洛塘,南壤文县,西靠五库,北连月照。民国35年设乡建政,驻地坪头坝;清代以河命名,名曰“三仓河”,隶属碾纳里。有清一代行商坐贾之人,东进汉中,南下巴蜀,往来之间与秦文化、巴蜀文化交融濡染,形成了独具其地域特色的三仓河文化。加之清代三仓学塾发达,据清光绪叶恩沛修、吕震南纂的《阶州直隶州续志》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州守洪惟善于(坪)头坝建义学一所,开其官学之端倪,后塌废。光绪九年(1883年),州守叶公复设平头坝义学。至此,木铎响于深山,人文蔚起;金声闻于南地,学校昌明。故,商贾之往来,学校之昌明是三仓清代匾额文化兴起发展之重要原因,亦是其文化基础。

匾额之用,滥觞于先秦,始见于汉相萧何题写“苍龙”“白虎”两阙之匾额,发展完备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古有“无处不匾,无门不匾”之盛况,明费瀛有:“堂不设匾,犹人面无目然”之高论。对于匾额中的“匾”字,古也作“扁”,《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匾,即是悬于门屏上的牌匾。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横着的叫匾,竖着的叫联。但如今,人们已然不分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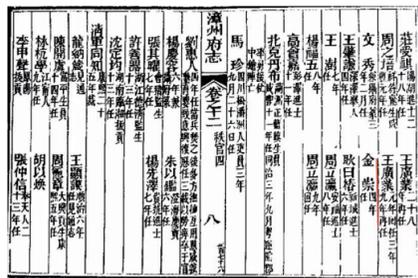


“工部世裔”匾

此细致,统称为匾额。

此匾,为三仓境内已知现存最早等级最高之匾,悬挂于三仓镇清光绪生员杜蔚故居,为钦命陕甘全省加五级纪录五次金崇题,木质,磁青底金字颜体双款,上款:钦命陕甘全省加五级纪录五次金崇;下款:生员杜蔚立。

匾文:工部世裔。工部,古代官署名;汉代有民曹,魏晋有左民、起部,隋唐因北周工部旧名总设工部,为六部之一,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长官为工部尚书,下设侍郎、员外郎等



《漳州府志》

职。世裔,指世胄,意思是贵族后裔。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局变乱,边疆形势危机,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入蜀任成都尹,又接替高适兼任剑南节度使,期间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作为自己的参谋,因此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当地杜姓宿老讲,他们的先祖系陕西杜氏,出自京兆堂杜氏一脉,与唐朝大诗人杜甫同出一族或其后裔,后辗转迁徙至此,故称自己为工部世裔。匾为木质,磁青底金字,字体雄健有力,敦厚端庄,点画圆满周到,不失威严,尤显神秘,其色鲜艳夺目,本为皇家专用,用此民宅,

此为越制。窥此一斑,可知晚清地方大族势力增强,朝廷为嘉励和拉拢地方势力,放松了对匾额使用权的严格管控。据刘光瑞所著《中国匾额学》一书所论,当时制作一面这样的匾需用土漆10斤,黄金2两打金箔,用功半月。贴着金箔的“工部世裔”四个大字在磁青色的底色的衬托下,悬挂于生员杜蔚故居正堂之上,彰显着昔日其主人的地位之高和财势之大。

上款:钦命陕甘全省加五级纪录五次金崇。 “钦命”指皇帝的诏命,此匾意指立匾者为皇帝任命,以显皇恩在身,无比荣耀。

“加级”和“记录”是清代对官员的议叙赏赐制度。纪录有三等:纪录一次、纪录二次、纪录三次。纪录四次,即可加一级(加到三级,需十二次)。议叙加级食俸者,照所加之级支俸;加级给予升衔者,照所加之级换给顶戴(晋升官职)。《大清会典》:“凡议叙之法二:一曰记录,其等三。二曰加级,其等三。合之,其等十有二。”清朝对官员议叙赏赐之法共分十二等次:记录一次,记录二次,记录三次,加一级记录一次,加一级记录二次,加一级记录三次,加二级,加二级记录一次,加二级记录二次,加二级记录三次。加三级,加三级记录一次,加三级记录二次,加三级记录三次。清代官员议叙的结果,是京察、大计和升职时评定官员政绩优劣等次的依据。加级可以抵销降级、罚俸等处分。

金崇其人史料甚少,仅见《漳州府志》与《芷江县志》有只言片语可采。金崇,正白旗举人,道光元年(1821年)署任沅州知府,于咸丰四年(1854年)任漳州府知府,同年离任。由上款可知金崇曾牧守陕甘,奈何史料有限详情难知。(连载一)